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卡尔·曼海姆 著
艾彦 郑也夫 冯克利 译

文化社会学论集

新世纪
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社会学论集 / (德) 卡尔·曼海姆著; 艾彦, 郑也夫, 冯克利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6490-6

I. 文… II. ①卡… ②艾… ③郑… ④冯… III. 文化社会学—研究 IV. 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067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任 编 辑	刘国玉 李忠孝
美 术 编 辑	吴光前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任 校 对	李守勤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 数	200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13.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洋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阅读曼海姆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

——译者序

本书的选题和翻译过程是这样的。

1984年我开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985—1986年赴美国留学,在此期间阅读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1987年回国,花费了一年时间完成了《知识分子研究》一书(未出版)。1988年开始组织翻译“知识分子译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论述知识分子的章节选进了我编辑的译本中。但是直到1991年,我才发现曼海姆的这部书《文化社会学论集》。我首先阅读的是该书第二部分“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读后惊叹:自曼海姆去世至今已四十余年,知识分子的研究几乎无出其右;这部著作显然要比读书界公认的曼海姆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更出色。读后一气呵成翻译完了“知识阶层”这一部分——这种翻译的冲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以后这篇长文分三期发表在两个杂志上。再以后知识产权在中国登陆,因联系版权的困难,这本书的出版被搁置。1999年时猛醒,曼海姆已经去世52年,版权问题不复存在了,便邀请艾彦、冯克利先生参加翻译。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精神社会学,知识阶层,文化的民主化。艾彦翻译第一部分以及编者说明和引论,我翻译第二部分,冯克利翻译第三部分。艾彦先生翻译过精神现象学著作,冯克利先生翻译过民主理论的著作,我曾经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每个人都算得上熟门熟路。且因三部分所覆盖的是各自独立性较强三个领域,术语共用的特征较弱,联系主要发生在深层,故未作统校,三位译者文责自负。

以下向读者简介曼海姆和他的这部著作。

曼海姆 1893 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母亲是德裔犹太人。因为当时地缘政治的因素，曼海姆是在德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他曾在匈牙利大学学习哲学，1912—1913 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从师社会学家齐美尔。以后在布达佩斯加入左翼思想家卢卡奇组织的社团。1918 年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曼海姆虽未加入共产党，但进入了共产党人组建的布达佩斯大学任教。1919 年革命失败后，逃亡德国。以后虽思想上仍倾向左翼，但远离政治。1922 年发表了博士论文《认识论的结构分析》，此后日益从哲学转向社会学。1925 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3 年因纳粹的崛起逃亡英国。曾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伦敦大学教育系教授。社会学史的研究者认为，定居英国使曼海姆告别了德国文化。在适应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曼海姆的学术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认为他在英国的作品逊色于他在德国时代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曼海姆代表作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出版于 1929 年，而自 30 年代初期他开始写作本书。本书英译本编者说，曼海姆是将之作为首尾一贯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来撰写的。在德国期间完成了初稿，纳粹的崛起使他亡命英国，在英国时曾对本书作出一些重要修改，终因新的环境中的压力而将其束之高阁。逝世后才经后人整理出版。欧内斯特·曼海姆在英译本引论中说：“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部书是曼海姆最成熟、最深刻的作品，是他在德国文化氛围中的绝响。

理解往往主观。客观全面的介绍难乎其难。因此，笔者索性摘取本书中那些最令自己感动的观点。希望它是游历曼海姆精神宫殿的一支路标。

近代社会的巨变迫使人们扔掉以往加在他们身上的标签，重新思考“我是谁”。又因为没有孤立于社会生活和群体之外的个人，因而自我觉醒总是加入到集团觉醒的过程中。在近代社会中第一个完成这种

解释的是“阶级的学说”，简称“阶级社会学”，它催化了无产阶级的觉醒。继而，其他阶级、阶层、集团，包括妇女群体、青年群体，也都开始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当知识阶层也努力以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评价自身时，他们发现那条道路已经被堵住，那里耸立着一个极富魅力的解释——阶级的学说。他们自己首先被催眠了。按照阶级学说的解释，知识阶层不是阶级，不能在社会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是“毛”，必需附着在“皮”上，追随某一张“皮”。“当他遭遇到另一群体居高临下的世界观时，他的傲慢终结了。这种情形解释了知识阶层自尊的突然下降，他往日的自负让位于今日的谦恭。”

阶级学说无疑是近现代各种解释系统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但是它在认识知识阶层问题上，至少带有两个问题。其一，忽视了文化超脱和超越现实的一面（固然有服务现实的一面），因而轻视了承担文化职能却不属于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其二，在执著于阶级分析法时，它只完成了一个判定：知识分子不是阶级，这是对的；但认为这是导致知识分子身上若干缺陷的根源，却是不恰当的。“不是阶级”是知识阶层的群体特征。所谓特征，既是短处所在，又是长处所在。阶级学说在判定了知识阶层“不是什么”后，在认识他们“是什么”上无所作为。

知识阶层是什么，其长处又是什么？曼海姆的答复如下。其一，“相对不受束缚的阶层”，他们并非完全独立于阶级关系，但他们的见解没有像多数社会成员一样完全被阶级地位所决定。其二，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这两点造成了他们的长处。“一些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享有最大的机会，去检验和利用社会上可以得到的视野，去经验它们中的矛盾和不一致。”“社会上没有一种职业，没有一种地位要求了解一切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保持着对我们的事务的同情，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务。”

曼海姆认为，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自近代以来怀疑在增长。怀疑使怀疑者的心理处于“悬置”的状态。多数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处于“悬置”期，那便是青春期——精神上的“狂飙期”。青年人“常常有过

卷入到一个超越其前途利益的问题中的经历。(他们)从自己以前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带着解放的感受发现了可选择的解释和新的价值观。”“而当他们度过了这一狂飙时期并固定在一个职业以后便扔掉了那种倾向。”但是有少数怪物终生在精神上处在“悬置”状态,不确信某种教义,他们就是知识分子。

有人批评知识分子远离生活。曼海姆认为,在现代分工的社会中没有人能逃脱普遍的疏离感。每个人必然只了解生活的一部分。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太实用。知识分子从现实生活的脱离可能更远一点,但他们恰恰因此获得了某种优势,他的疏离帮助他逃脱了特定职业对眼界的局限。

曼海姆在对民主的看法上与熊彼特享有很多共识。而曼海姆写作“文化的民主化”的时间要比熊彼特生前出版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1942)早了近十年。

曼海姆认为,既然民主是不可逆转的,政治思想家的首要责任就是揭示这一趋势的潜力和意义,(其)光明与阴暗并存的现实,从有利的角度影响它。

与众多民主理论研究者(包括后来者)不同的是,曼海姆认为:“政治民主仅仅是普遍文化原则的一种表现。”这种文化就是与古典贵族文化相对立的近现代的民主文化。他所着重讨论的正是作为政治民主基础的文化民主。

曼海姆认为,民主包括三项原则:其一,本体论上的平等,即社会成员本质上是平等的。其二,承认个人的独立性。但是在这里民主呈现出两个侧面。一方面,它承认乃至鼓励独立性。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不停地充分行使其影响公共决策的权利,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民主制度需要一些机制,它们“不是从外部强加于民主社会的,它们本质上要靠群众自愿放弃充分利用自己的能量。”比如政治领域中的代议制和文化选择上的从众心理与时尚。其三,民主社会没有排除精英,它只是一种新的精英选择方式——在这一点上曼海姆

与熊彼特高度一致。“民主和非民主的精英选择之间的不同，是选择基础的广度。（前者）对精英的吸收不限于某个封闭的团体的成员。”

曼海姆认为，民主文化覆盖的社会中“社会距离”——这是他深入讨论的概念——在缩小。虽然社会距离不会消失，但它不再壁垒森严，并且呈现差异的多元化。曼海姆还认为，由于古典社会中固定身份在近代社会中的瓦解，人们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心理上的安全感。“丧失安全作为一种普遍的命运，不再局限于社会底层，而是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这一观点似乎与半个世纪后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的宏论遥相呼应。

除此，我们还有很多根据说明，曼海姆是思想领域中的先知。当然，希望先知的称谓不要引起误会，因为与此同时，并且在更本质上，他是伟大的怀疑主义者。

阅读曼海姆受益无穷。阅读曼海姆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

郑也夫

2000年7月6日

北京南礼士路住所

原书编者说明

本书是我们所编辑的卡尔·曼海姆的四卷本社会学著述的最后一卷,其主体部分是说英语的广大读者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这套书当中的两卷,即《知识社会学论集》和《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集》,包含了作者最初以德文发表的主要专题性论文,以及作者在旅居英国期间撰写的一些比较短的论文。这套书当中的第一卷,即《自由、权力和民主规划》,收录的是曼海姆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系统性专著,在这里作为遗作出版。本书作为这套书的最后一卷,回过头来收录了作者早期撰写的著述,而且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测那时的作者纯粹是由于外部境遇而无法把这些著述呈现给公众。

曼海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把《文化社会学论集》当做一部首尾一贯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来撰写的;在那以后不久,纳粹主义的出现便使他不得不终止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在他刚到英国的那些岁月里,他对本书的初稿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但是,最后还是由于在新的环境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而面对的一些大相径庭的问题的压力,而把它搁置起来了。不过,我完全同意本书的编辑们的下列看法,即它所表达的思想、所反映的看法确实一点也没有过时,而且现在正是把它们呈现给英美公众的最合适的时刻。

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坎萨斯城市大学社会学系的欧内斯特·曼海姆(Ernest Manheim)教授,和加州圣英尼卡市的兰德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协会的保罗·凯茨克米蒂(Paul Kecskemiti)博士进行的;前者负责本书的前两编,后者则准备了论述“文化的民主化过程”的最后一编。需

要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人们常说的翻译的范围。使本书得以产生的德国学术氛围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全书的论述风格,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作者在实质内容方面对所提出的那些个别问题和答案的强调。为了使这些以另一种语言习惯表达出来的观念所具有的意义(meaning)和涵义(import),能够为由不同的传统培养的不同的一代读者所理解,两位编辑只好在不歪曲作者之意向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原来的本文。值得庆幸的是,对于从事这样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事业来说,两位编辑完全具有专业方面的资格。曼海姆教授自协助作者修改手稿之日起,便对原来的本文非常熟悉。凯茨克米蒂博士作为这套书中以前出版的《论集》^①的编辑,已经具体表明了他对曼海姆思想的深刻理解。我本人曾经对照原来的本文核对过这份译文的定稿,因而可以证明它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忠实原文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向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世界事务研究所提供过一笔资助,用来支付准备出版手稿所需要的费用。

我们要向作者的遗孀朱莉娅·曼海姆博士特别表示感谢。对于所有有关的编辑来说,她与卡尔·曼海姆的终生相伴和她对他的著作之重要意义的深刻理解,都使她成为信息和建议的最重要的源泉。这套书的成功完全出版,确切地说也是她的成就。

阿道夫·洛(Adolph Lowe)

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世界事务研究所

注 释:

①即《知识社会学论集》和《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集》。——译者注

目 录

阅读曼海姆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

——译者序

原书编者说明

引论	1
走向精神社会学：一个引论	17
一、对这个主题的首次探讨	17
(一)重新考虑黑格尔——从精神现象学到精神社会学	17
(二)关于社会的科学和精神社会学。综合的困难之处	20
(三)这种探究的试探性。它的最初目标：批判有关社会和精神的虚假概念	27
二、有关历史和社会的虚假概念和恰当概念	29
(一)关于一种内在的思想史及其出现原因的理论——兼论艺术史	36
(二)“物质”属性和“观念”属性的虚假的两极分化过程	38
(三)有关历史、辩证法以及中间状态的虚假概念	41
(四)各种角色的间接特征，各种感知和补充性情境的社会循环过程	51
(五)走向一种适当的社会概念	58

(六)对走向精神社会学之诸步骤的初步概括论述	61
(七)社会学的三种类型和精神社会学的相应层次;结构和因果关系	62
三、有关精神的恰当概念和不恰当概念	67
(一)对黑格尔的精神论的第二次回顾	67
(二)精神概念的发生	68
(三)精神的主观表现和客观表现,意义的社会发生	73
(四)意义的超个人特征	78
(五)对作为一种观念模型的隐德来希的批判	79
(六)说明的程序和揭示的程序,各种事件的结构	81
(七)关于世界是不是具有结构的问题	84
(八)重新考察的因果关系说明和揭示性说明	85
(九)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结构概念和随机概念,多重因果关系问题	88
(十)史学研究与结构观点	90
(十一)作品的基质和行动的基质	91
(十二)发现作品和行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92
四、精神社会学概要	93
(一)处于公理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社会本体论及其与思想的历史特征的关联	95
(二)处于比较类型学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	98
(三)处于历史性个体化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	99
五、扼要重述: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精神社会学	100
(一)公理式的观念	100
(二)比较类型学	101
(三)关于个体化的社会学	101

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	110
一、社会群体的自我发现	110
二、知识阶层社会学理论的轮廓	118
三、社会群体怎样获得了认同	123
四、知识阶层的类型	127
五、当代知识分子	130
六、知识阶层的历史角色	136
(一)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	137
(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社团关系	138
(三)知识阶层和阶级	153
(四)知识分子的社会住所	164
七、知识分子的自然史	168
八、知识阶层的当代处境	174
文化的民主化	189
一、政治民主在其充分发展阶段的若干问题	189
二、作为一种普遍文化现象的民主化问题	191
(一)民主的三项基本原则	191
(二)人人平等的本体论原则	197
(三)社会单位的独立性	203
(四)民主制度中的精英及其选择模式	213
(五)迷醉问题	249

引 论

本书所收录的三篇论文大部分是曼海姆在德国的最后几年中撰写的。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即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著作——的续论，因为这三篇论文所涉及的也是意义的社会衍生过程。不过，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我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一种尝试，即把对德国唯心主义那些过分主张的醒悟，转化成一种关于思想的社会学理论的尝试。曼海姆的批判所针对的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两个方面——对观念在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过高评价，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假定那些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概念，本来就是在某种诸如一个逻辑连续体(logical continuum)的东西内部从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演化的倾向。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试图为研究作为社会牵连(social involvements)之功能而存在的观念概括论述一种方法。一旦人们放弃了这种有关观念之自动演化过程的意象，他们就可以探索存在于思想与其社会具体环境(milieu)之间的关系了。

人们不仅容易夸大这种努力所涉及的范围，也同样容易使它的目标过于简单化。例如，某些评论家一直认为，知识社会学自以为拥有一整套关于真理的准则，并且把自己装扮成某种仲裁党派争端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是那些在其他领域从事研究工

作的社会学家所没有的。其他人则担心这种努力的目的在于，对受到社会制约的思维过程之诸认识功能(cognitive functions)提出质疑：因为如果这种社会学家把观念解释成人们对特定的情境所作出的反应，那么，他就会在这种贬低有关知识的所有主张的事务中承担某种专家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家认为，社会学家这种非法侵入观念化王国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窘迫不安的、对人们漠不关心基本的价值观和真理的表达。

在说英语的国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们一般说来并未产生这种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诸涵义的忧虑。它的论断所具有的倾向，与英国和美国的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学评论的发展趋势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各种社会现实的某种直观意识。对于由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功能人类学、萨姆纳的民德(mores)相对论、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W. I. 托马斯的情境方法以及科日布斯基^①的语义学培养起来的一代又一代学者来说，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工具的相对主义——曼海姆虽然拒绝承认这种相对主义，但是，他对各种各样主题的批判研究实际上都把它隐含在其中了——的幽灵几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恰恰相反，出现在美国的部分不同意见所一直针对的，正是理智主义的某些残余成分——读者也许能够在曼海姆的包括本书在内的某些著述中，觉察到这些残余成分。

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呢？

各种概念都表现人们对既定情境所作出的解释性反应。我们实际上正在研究的是四种变量：(一)诸如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一场革命、或者一个阶级这样的情境；当我们对它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便试图解释它；(二)尤其被牵连到情境之中的个体，以及他相应地形成的关于这种情境的意象。这样一些牵连也许包括各种职业目标、政治抱负、亲属关系纽带、经济上的竞

争和联盟——简而言之,包括一大批部分同时出现的与群体的牵连;(三)诸个体或者诸群体所采纳的意象;(四)这种意象的传达所针对的观众,包括他们对它的各种特殊理解,它把意义附着于其上的各种符号以及某种与它相对应的词汇。

我们必须把这四种观念化因素当做相互依赖的变量来考虑。同一种对象在不同的情境中会得到不同的概念化。那些以不同的形式牵连到同一个情境之中的个人,将会作出对这个情境的不同说明,并且往往会相应地对它进行不同的改变。最后,个体是根据他实际面对或者暗中预期的观众来设想一个主题的,而且,一种信息的形式和实质内容,都会由于这位著作家或者演说家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的观众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社会学家必须假定这四种因素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把其中任何一种因素当做独立变量来处理,都会把某种不加批判的和没有根据的决定论类型——无论这种决定论是行为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还是进化论的——引入这种对观念化过程的研究。例如,假定共同的经济地位必然导致完全相同的社会观念,就像反过来假定某些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的流行,本身事先规定了诸个体或者诸群体对于其情境采取什么观点那样,都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人们可以使一种探究本身只局限于涉及这四种因素当中的两种或者三种之间的关系。曼海姆在论述知识阶层的这一编中正是这样做的——在这里,他把某些观念化类型与其创始者的社会习惯联系起来。他对怀疑主义的社会起源所进行的论述表明,人们只借助于两种变量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在这篇著作中,曼海姆出于我将在后面指出的原因,有意识地避免对第三种变量——历史情境——加以引申式的运用。人们可以假定,他在形成各种概念的过程中已经觉察到第四种变量,即观众。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最后一编中对民主过程和诸如形式主义和真理的操作标准的论述,表明他已经觉察到了这第